

夷陵之战研究

黄权江北诸军

夷陵道

孙吴水军

虎牙山

王前程

著

宜都

陆逊主力



彝亭

夷道

刘备主力

吴军偏师

马鞍山

水

历史风云
刀光剑影
龙腾虎跃
英雄成败
三国之争
争在荆州
争在夷陵
荆洲之争
争在夷陵

秭归

长

江

中州古籍出版社

夷陵之战研究

王前程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夷陵之战研究 / 王前程著. -- 郑州 : 中州古籍出
版社, 2013.12

ISBN 978 - 7 - 5348 - 4592 - 5

I. ①夷… II. ①王… III. ①战役 - 研究 - 中国 - 三
国时代 IV. ①E293.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0726 号

出版 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旺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 mm 1/16 印张：14.5
字 数：270 千字 印数：1 - 1660 册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王齐洲

三国时代是一个战争频仍、英雄辈出的时代，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战争舞台上扣人心弦的表演，书写了中国古代军事史的精彩华章，也催生了影响深远的文学巨著《三国演义》。无论在史学界还是文学界，大家都将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并称为“三大战役”，充分显示了这三次大战在三国军事史上和长篇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中的重要地位。不过，在“三大战役”的研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赤壁之战”，其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不仅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还出版了不少研究专著和专题论文集；而对于“夷陵之战”和“官渡之战”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文学界对于“夷陵之战”虽曾有过多次探讨与争论，也发表了一批颇富新意的学术论文，但据我所知，深入系统的研究还很不够，至今尚未出版一部专门研究“夷陵之战”的有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这与此次战役的地位和影响很不相称。有鉴于此，王前程教授殚精竭虑，费多年之力，对“夷陵之战”做了多层次、多侧面、全方位的探讨，对学术界诸家之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撰成《夷陵之战研究》一书。这是迄今为止研究、探讨“夷陵之战”最全面、最具体、最深入的一部学术专著。我一直关注着有关方面的研究，理解研究的辛苦及其价值，以为前程教授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值得大家重视。

历史上的“夷陵之战”与“赤壁之战”一样，都是发生在荆楚大地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大战役，但由于史籍记载过于简略，加上小说《三国演义》生动的文学描写的干扰，致使其战役规模、参战将帅、进军线路、战场方位以及战争之前因后果等等具体问题始终烟云模糊，研究者们的看法也颇多分歧。《夷陵之战研究》一书，以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等第一手史料为依据，着重研究了历史上“夷陵之战”的方方面面，同时也认真探讨了文学家笔下的“夷陵之战”。毫无疑问，作者在研读历史著作和文学著作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详细剖析了有关“夷陵之战”的诸多疑问，并将历史记录与小说虚构故事、民间传说故事等严格区分开来，观点鲜明，思路清晰，严谨求实，不发空论，显示了作者较为深厚的文史功底与严谨求实的学风，也使得该论著的质量较之以往的一些研究论著有较大的超越。

《夷陵之战研究》共十章，围绕吴蜀“夷陵之战”及相关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内容相当丰富，涉及的知识面也很广，包括历史、文学、军事、地理、交通、民俗等等，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然而，作者对于诸多问题的研究并未平均用力，而是做到重点突出，有很强针对性。比如，论著着重探讨了“猇亭”等夷陵之战主战场的方位问题。当年刘备与陆逊进行决战的主战场猇亭等地究竟位于江北还是江南？这一问题长期困扰着学术界。自《大清一统志》将江北虎脑背指为三国古战场“猇亭”之后，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支持“猇亭江北说”，几成定论。然而，这种在“夷陵之战”发生了一千五百年后所作的定论，与陈寿《三国志》关于刘备大军“自在江南”的记载明显不符，很难使人信服。本书第六章与第七章引用了大量材料来论证“猇亭江北说”的错误，并深入挖掘造成“猇亭江北说”流行的种种原因，细致而严密。考察失去踪迹的古战场的具体方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仅需要顾及历史文献的原始记录，还需要深入了解古代军事技术和郡县沿革、地形地貌、交通条件等问题。当代许多学者在研究探讨这一问题时，往往根据当前的情况来考察千百年前发生的事件，“以今论古”，做出一种看似合情合理的推测，这样得出结论，不但不能解决历史问题，反而会使历史问题更加复杂。与一些足不出户的书斋学者不同，前程教授围绕“猇亭”等三国古战场的方位问题做了多次深入细致的实地田野调查，探访了古夷陵（宜昌）和三峡地区的山川地形条件与古代驿道线路，他力主“猇亭江南说”，既是基于原始史料记载所作的判断，也是基于实地考察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在我看来，这种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较之想象而空泛的推测要可靠得多；尽管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他也作了一些推测，但这样的推测是建立在文献与实物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比较合理的。

用事实说话，不排斥异说，兼容并包，视野开阔，也是《夷陵之战研究》的一个优点。对于学术争论和认识分歧的问题，前程教授始终持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他从三国大文化的观念出发，来审视当代学术界关于三国遗迹之争的问题，认为河南南阳和湖北襄阳的“古隆中”之争、湖北蒲圻和湖北黄州的“赤壁古战场”之争、湖北宜昌地区的猇亭江北与猇亭江南之争等等，都属于“三国文化”的范畴，双方都不应该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排斥对方，即使证明了某处不是历史遗迹，但亦属于文学遗迹，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诚然，正常的学术争论和认识分歧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只要不过多地搀杂世俗的观念和名利思想，学术争论是有利于研究工作深入开展的，对于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是有益无害的。学术界需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也需要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前程教授能秉持这样的科学态度和文化精神，令人欣慰。他和我是多年的朋友，为人坦荡，嘱我作序，乃勉力为之。希望他再接再厉，为三国历史与文化研究做出更大更杰出的贡献。

2013年11月20日于武汉紫菘·枫林上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章 夷陵险要与三国争雄	1
一、楚之西塞,川鄂咽喉	1
二、三国之争,争在荆州	5
三、荆州之争,争在夷陵	12
第二章 关羽失荆州与刘备震怒伐吴	17
一、关羽毁败,失在何处	17
二、吴魏夹击,关羽独力难支	23
三、刘备麻木不仁,蜀汉连连失策	28
四、蜀汉集团沉迷于帝王梦及其惨重代价	34
第三章 夷陵之战的规模及参战将帅	38
一、当代学术界关于夷陵之战强弱问题的争论	38
二、夷陵之战中蜀汉参战兵力究竟是多少	41
三、夷陵之战中双方参战将领略考	47
第四章 夷陵之战的全过程	54
一、战役第一阶段:蜀汉进攻阶段	54
二、战役第二阶段:吴蜀相持阶段	57
三、战役第三阶段:东吴反攻阶段	61
第五章 吴胜蜀败的原因及其借鉴意义	68
一、东吴大获全胜的原因	68
二、史学界对于蜀汉败因的探讨	76
三、蜀汉惨败夷陵的根本原因	83
四、夷陵之战的借鉴意义	89

第六章 夷陵之战主战场方位考论(上)	95
一、学术界关于夷陵之战主战场方位的分歧	95
二、原始史籍记载夷陵之战主战场在江南	101
三、形势和地形促使刘备选择江南路线	105
四、猇亭等主战场之具体方位考察	114
五、古战场“猇亭”失去踪迹的原因	121
第七章 夷陵之战主战场方位考论(下)	126
一、《大清一统志》之记述直接造成猇亭“错位”	126
二、《三国演义》的文学描写混淆了战场方位	134
三、江北夷道县的设置与合并导致“猇亭”移位江北	139
四、《三国志》笼统的记述是猇亭等地“错位”的历史基础	146
第八章 蜀汉民族政策与蛮夷拥蜀反吴	154
一、蛮夷部落在荆州夷陵之争中的积极作用	154
二、开明的民族政策是蛮夷部族拥戴蜀汉的根本原因	160
第九章 《三国演义》中的夷陵之战	167
一、文学夷陵之战中纯虚构的人物故事	167
二、文学夷陵之战中据史加工的人物故事	174
三、文学夷陵之战遵循的艺术原则	180
四、以假乱真：文学夷陵之战的深刻影响	190
第十章 夷陵之战与民间地名传说	195
一、猇亭之战文学地名传说	195
二、猇亭之战历史地名传说	202
三、如何看待“猇亭”之争及相关传说故事	212
夷陵之战地图集	219

第一章 夷陵险要与三国争雄

汉末三国时期，是一个烽烟滚滚、战火不息的时代，频繁而惨烈的战争夺去了无数百姓与将士的生命，那真是一个不堪回首、令人伤悲的动荡岁月！然而，人类无法回避历史上的战争，从一定程度上讲，人类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战争历史。因此，我们又不得不去总结战争的历史，去研究历史上的战争。三国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英雄往往因战争而闻名，战争往往因英雄而决定胜负。曲折复杂的三国战争，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三国军事文化，留给后人许多常说常新的话题。

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是汉末三国时期最负盛名的三大战役，也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性战役。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胜局，赤壁之战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基础，而夷陵之战（又称猇亭之战）最终确定了三国的基本格局。三大战役使曹操、周瑜、陆逊等三国英雄享誉史册，也使官渡、乌巢、赤壁、乌林、夷陵、猇亭等地驰名天下。

那么，三大战役中的夷陵之战为何发生于夷陵？古之夷陵有什么特殊之处而引发兵家拼死争夺呢？

一、楚之西塞，川鄂咽喉

兵家常言：战争充满着不确定性，但战争的胜负取决于综合因素，其必然性无疑大于偶然性。而战争发生于何地，则随着双方军事态势的变化而变化，偶然性往往大于必然性，但又无疑包含了一定的必然性，因为精明老到的将帅们一定会选择最有利的地形来进行作战以取得战争的胜利。

宜昌，古称“夷陵”。北宋文豪欧阳修在贬官夷陵期间，写了大量关于夷陵山川地形的诗文，其《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一文曰：“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

以为名；或曰巴峡之险，至此地始平夷。”可见，夷陵之名缘于二说：一是应劭注释《汉书·地理志》所云：“夷山在西北。”^①二是因山川形势而名：三峡之激流至此而始平夷，三峡之高山峻峰至此而多丘陵。

《史记·六国年表》云：“秦拔我郢，烧夷陵，王亡走陈。”^②作为楚国的城邑名，“夷陵”始见于正史。秦灭楚后设置南郡，夷陵邑隶属于南郡；两汉时期置“夷陵县”，隶属荆州南郡；三国时吴改称“西陵县”；六朝以后又使用过“宜州”、“拓州”、“峡州”、“东湖”等名称，清代升为“宜昌府”。今为湖北省西部重镇、省属副中心城市，下辖三市五县：枝江市、当阳市、远安县、兴山县、宜都市、秭归县、长阳县、五峰县。前四县、市位于江北，后四县、市位于江南。最大纵距一百八十余公里，东西最大横距一百七十余公里。尽管宜昌地区在历代所辖郡县不尽相同，但其中心区域基本没有变更。

夷陵地处长江西陵峡之东端，位于长江中游与上游的交界处。其北倚神农架，又与荆山山脉毗邻，其东与江汉平原相连，其南与武陵山脉、很山山脉相接，其西为巫山山脉。高山、丘陵、平原兼有，自西向东逐级下降，形成了西连千里群山、东接广袤平原的地貌。且境内河流纵横，长江横贯其中，西通巴蜀，东连荆楚，江南有清江等支流，江北有漳水、沮水、黄柏河、香溪等支流，自古即为军事重镇，素有“楚之西塞”、“川鄂咽喉”之称。先秦兵学大师孙子曾云：“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③我方得到此地十分有利，敌方得之同样有利，对这样的地点和区域敌我双方都会拼死命去争夺，这就是“争地”。夷陵地形实为“争地”，即是古人常说的“兵家必争之地”、今人所谓的“战略要地”，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意义。在冷兵器时代，无论从巴蜀进攻荆楚，还是从荆楚进攻巴蜀，都会选择夷陵作为前沿阵地。

夷陵的重要军事价值，在历代著名历史地理著作中均有记述：

《汉书·地理志》：“夷陵，都尉治。莽曰‘居利’。”^④都尉，汉代武官名称，掌管社会治安，保障一方稳定。西汉时期，少数郡县不设太守、县令，而仅设都尉，这样的都尉权位极高，集军、政首长于一身，其重心则是负责一方之守卫。汉王朝在夷陵

^①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61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十五，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11页。

^③ 《孙子兵法》，见郭化若《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页。

^④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61页。

县设置都尉治所，充分说明了坐镇夷陵对于保障一方安宁的重要性。所以，王莽执政时期曾直接将夷陵县改为“居利县”，所谓“居利”，即居于此地有利的意思。

《后汉书·郡国四》：“夷陵：有荆门、虎牙山。”^①《后汉书》在“夷陵县”下之所以独提及荆门山和虎牙山，是因为二山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与价值。盛宏之《荆州记》卷一《南郡》云：“郡西沿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门’，北岸有山，名曰‘虎牙’。二山相对，楚之西塞也。”^②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亦云：“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荆门在南，上合下开，暗彻山南，有门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红，间有白文，类牙形，并以物像受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③ 可见，自春秋战国以来，夷陵境内的荆门、虎牙二山就是极其重要的江关要塞。

在割据对峙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夷陵常常处于南北东西割据势力的边陲重镇，其政治军事地位始终受到高度重视。《隋书·地理下》曰：“夷陵郡：梁置宜州，西魏改曰‘拓州’，后周改曰‘硖州’。”^④《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四十七曰：“峡州：夷陵郡。今理夷陵县。春秋及战国时并为楚地，故曰荆门、虎牙，即楚之西塞。秦将白起攻楚，烧夷陵，即其地。秦以此地属南郡。二汉因之。曹操平荆州，于此置临江郡。《吴录》云‘蜀昭烈皇帝立宜都郡于西陵’，即夷陵也，在吴、蜀之界，吴得之，颇为重镇。……梁武帝天监中于此置宜州，以旧宜都为州之名。后魏改宜州为‘拓州’，盖取开拓之义。周武帝以州扼三峡之口，复改为峡州。陈尝得之，以为重镇。隋伐陈，陈人守荆门、狼尾滩，并在宜都界也。又《荆渚记》云：‘夷陵郡居大江之上，西通全蜀，故夷陵有安蜀城存焉。’隋为夷陵郡。唐武德四年平萧铣，置峡州。”^⑤ 可见，无论三国、两晋还是南北朝、隋、唐，夷陵均为兵家必守、必攻的要害之地，也是各个政治军事集团及封建王朝都极为重视的州郡。

两宋时期，由于长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军事攻势的威胁，夷陵的军事价值更被关注。《宋史·地理志》载：“峡州，中，‘峡’字旧从‘硖’，今从‘山’。夷陵郡，军事。”^⑥ 直接将“夷陵”定为军事重地。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大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湖广四》之“夷陵州”条下，曾记述了南宋初期部分大臣评

^① 范晔《后汉书》志第二十二，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71页。

^② 盛宏之《荆州记》，见谭麟《荆州记点注》，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③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陈桥驿校证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94页。

^④ 魏征《隋书》卷三十一，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04页。

^⑤ 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60—2861页。

^⑥ 脱脱等《宋史》卷八十八，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77页。

估夷陵战略地位的言论：“宋吕氏祉云：‘荆州要害，实在夷陵。’胡氏安国曰：‘峡州大都险要，皆在南岸。’祝氏鑑曰：‘晋之伐吴，王濬自梁、益以践荆门，杜预自襄阳以侵沅、湘，隋之取陈，秦王由山南以掠汉口，杨素由巴东以趋三峡。夷陵之安危，与荆州为存亡矣。’”^①

吕祉、胡安国在《宋史》中均有传，二人都是南宋初期颇富军事战略眼光的谋臣，吕祉做过兵部尚书，写有《东南防守利便》等奏议，胡安国乃南宋初年名士，写有《设险》等奏议；祝鑑与吕、胡二人同时，亦为南宋初期名士，喜谈兵。南宋初期的谋臣武将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夷陵在军事战略上的重大意义。在他们之前，北宋大诗人苏轼曾作《夷陵县欧阳永叔至喜堂》诗，亦提及了夷陵的军事价值：“夷陵虽小邑，自古控荆吴。”夷陵山谷交错，并非四通八达的繁华都市，但因为它位置特殊、地势险峻而成为举足轻重的军事关隘。

元明清大一统时期，夷陵成为内地城邑，其军事价值减弱，但依然常被人们看重。元人刘应李《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卷中在“峡州路”条下记曰：“西陵重镇，楚之西塞。西通全蜀，北辕襄、汉。”^② 指出了夷陵在地理上所具备的关口价值。《明史·地理五》之“夷陵州”条亦记曰：“元峡州路，属荆湖北道宣慰司。太祖甲辰年为府。九月降为州，直隶湖广行省。九年四月改州名夷陵，以州治夷陵县省入，来属。大江在南。西北有关曰‘下牢关’，夹江为险。又有西陵、明月、黄牛三峡，峡中有使君、虎头、狼尾、鹿角等滩，皆江流至险处也。西北有赤溪，东合大江。南有南津口巡检司。又东有金竹坪巡检司，后废。又西有西津关，东北有白虎关。”^③ 指明夷陵境内有多处关卡险隘，而在关隘处特设巡检司，既可以检查不法盗贼出入过往，又可以在特殊时期应对不测之变。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中云：“至于夷陵险要，自古所推。……窃谓夷陵建郡，而以施州属之，增置属邑，南北相丽，既以通楚、蜀之援，亦以厚巴、夔之势。”^④ 又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夷陵州”条中云：“州距三峡之口，介重湖之尾。战国时为楚重地……三国时为吴、蜀之要害。”^⑤ 都点明了夷陵

^①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册，第3679页。

^② 刘应李《大元混一方舆胜览》，郭声波整理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1页。

^③ 张廷玉等《明史》卷四十四，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24页。

^④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册，第3488页。

^⑤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册，第3678—3679页。

所独具的地理优势。

清代同治三年编纂《宜昌府志》卷二《疆域志》对宜昌（夷陵）地区的地理形势亦多有描述：“介居夔、澧、朗、鄖、襄、荆、郢间，控楚蜀之交，带蛮部之阻，凭险扼要，形格势禁，洵全楚西塞上游第一关，肩也哉！群峰叠秀，江水潆洄，自巫峡而蜿蜒，由巴流而奔放，倚东山为屏，吞三峡而绾轂其口。雄当蜀道三千，巍镇荆门十二。……万山雄峙，二江奔流；锁钥荆襄，咽喉巴蜀；北控房陵之腹，南拊夜郎之背；水陆要冲，上游重地。”^①

总之，夷陵地处西陵峡口，西扼巴蜀，东控荆吴，实为咽喉门户、关隘要塞之地，自古即具有得天独厚的军事战略价值，为历代兵家所关注。正如清人顾祖禹所总结的那样：“三峡为楚、蜀之险，西陵又为三峡之冲要，隔碍东西，号为天险，可不知所备歟？”^②在汉末三国群雄纷争时期，号为“天险”的夷陵更加突显了其巨大战略价值，吴蜀大战发生于夷陵之地，实有其必然性。

二、三国之争，争在荆州

夷陵位于荆州南郡之西部，所以说到夷陵，不能不说到荆州。东汉时期的荆州是一个广袤的区域，下辖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七郡（汉末又曾将南阳郡东部地区划分为章陵郡，故而有时又称荆州八郡），共有一百一十七个县、邑、侯国。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湖北大部、湖南全部、河南南部及广西、广东、江西、贵州、重庆等部分地县，而荆州的中心地带则是南郡和江夏二郡，即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相当于今天湖北省的主体部分，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统治中心区域。那么，荆州在群雄纷争、天下分裂的汉末三国时期有何重要的战略地位呢？

（一）荆州乃三国兵家关注的焦点

古荆州江汉平原，位于中国中部，是通往东西南北的要冲，乃著名的形胜之地，其境内又有三个战略支点，即东有武昌（今湖北省武汉市），西有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西北有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构成了一个横卧的三角形。其中，东汉时期的

^① 宜昌市档案局档案馆整理《宜昌府志》，鄂宜图内字〔2001〕第17号，2002年版，第13页。

^②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册，第3515页。

武昌属江夏郡，江陵属南郡，襄阳一部分属南郡，一部分属南阳郡。对于荆州而言，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又是重中之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云：“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何言乎重在荆州也？夫荊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强，及郢、郢亡而国无以立矣，故曰重在荊州也。”^①又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湖广四》之“荊州府”条中云：“府控巴、夔之要路，接襄、汉之上游，襟带江、湖，指臂吴、粤，亦一都会也。……宋武帝以荊州居上流之重，资实兵用，居朝廷之半，故以诸子居之，不以属人。终六朝之世，荊州轻重系举国之安危。”^②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四十六《山南东道五》之“荊州”条亦云：“春秋以来，楚国之都，谓之郢都，西接巴、巫，东连云梦，亦一都会之所。”^③在顾氏等人看来，荊州乃中央都会之地，南有长江天险，东面、西面、北面分别有武昌、夷陵、襄阳三个战略要塞护卫，其得与失直接关系到举国之安危：控制荊州就能立国、强国，失去荊州便无立足之所。所以，凡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军事家都不会忽略荊州。

那么，汉末三国时期荊州的情形又如何呢？

东汉中平六年（189年），随着汉灵帝的驾崩，历史进入了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的时代。北方黄河流域群雄并起，董卓、袁绍、袁术、公孙瓒、吕布、曹操、刘备等等皆粉墨登场，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战争从未停息，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即汉灵帝驾崩的第二年，汉鲁恭王之后、汉末名士刘表出任荊州刺史。《三国志·刘表传》裴注引司马彪《战略》记载：刘表单马入荊州，礼请荊州大族蒯良、蒯越、蔡瑁等共商掌控荊州之策。蒯越向刘表献策云：“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荊州八郡可传檄而定。”^④刘表采纳了蒯越等人的建议，对政敌施以权谋，对民众广行仁义，又将刺史治所移至襄阳，重兵控制南郡、江夏等战略基地。经过数年努力，刘表不仅使自己成为“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⑤的军阀豪强，而且使荊州成为了相对安宁平静、经济繁荣的独立王国：“自中平以来，荊州独

^①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册，第3484页。

^②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册，第3652—3653页。

^③ 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30页。

^④ 陈寿《三国志》卷六，裴松之注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9页。

^⑤ 陈寿《三国志》卷六，裴松之注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9页。

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三国志》注引《搜神记》）^①这种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自然吸引了大批北方人南迁荆州以避战乱。其中，既有避乱的普通民众，也有隐居的著名文士，如王粲、司马徽、徐庶、诸葛亮等等，甚至连在北方无法立足的军阀刘备也南下来到了荆州。

然而，建安十二年（207年）以后，随着曹操集团统一北方大业的结束，各大政治军事集团的战略家们便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荆州，荆州的宁静日渐消失，并成为各大政治军事集团拼死相争、血肉横飞的夺命之地。《三国志·郭嘉传》注引《傅子》记载曹操与荀彧书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然与共论计，云当先定荆。此为不但见计之忠厚，必欲立功分，弃命定。事人心乃尔，何得使人忘之！”^②郭嘉死于赤壁之战前，这封信是曹操在赤壁大战失利之后写给荀彧追忆郭嘉生前言论的。郭嘉认为自己体弱多病，南方多疾疫，如果去南方征战，他一定会因病死于南方。但当曹操询问平定天下的方针大计时，他却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而极力主张在平定北方之后便南下夺取荆州，为最终统一天下奠定坚实的基础。《三国志·武帝纪》记述建安十三年（208年）初春曹操在基本清除北方残敌之后，立即“作玄武池以肄舟师”^③，为南征荆州作准备。说明不仅郭嘉认识到了荆州的战略价值，曹操本人也深知荆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曹操集团众多富于眼光的谋士无疑也看到了这一点。

对于荆州战略重要性的评估，最著名的当然是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建安六年（201年）冬，刘备在汝南被曹操打败后南逃至荆州，依附于刘表，刘表令刘备屯驻南阳之新野，看守荆州之北大门。《三国志·先主传》载：“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④可见，刘备与刘表貌合神离，刘表暗中防备刘备，刘备则打着自己的算盘，私下扩充实力以图东山再起。《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三顾茅庐，礼请年轻的诸葛亮出山相佐。躬耕襄阳隆中的诸葛亮便奉献了著名的“隆中对策”：“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

^① 陈寿《三国志》卷六，裴松之注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1页。

^② 陈寿《三国志》卷十四，裴松之注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9页。

^③ 陈寿《三国志》卷一，裴松之注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页。

^④ 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二，裴松之注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53页。

士思得明主。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正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① 尽管诸葛亮主张刘备谋取益州作为大本营，但总体原则是“跨有荆、益”，荆州乃“用武之国”，关系重大，必须首先设法夺占荆州这块战略基地，否则霸业难成。虽然刘备集团富于战略头脑的谋士将佐不多，但相信他们都会明白诸葛亮所说的深刻道理，刘备集团后来自始至终把“隆中对”作为基本国策加以实施，也充分说明了诸葛亮战略思想在蜀汉政权中深入人心。

然而，最早看准荆州战略价值的还是东吴集团的名士张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历》记载：兴平元年（194年），孙策最初居江都时，曾多次拜访因母丧居家的张纮，向他咨询世务。孙策坦率地谈到个人志向，说自己决心“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张纮答曰：“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②

张纮敏锐地指出，春秋战国之时，周室式微，天下诸侯割据，故而五霸功业应运而生；今汉室式微，群雄并起，类似春秋战国之世，孙将军若占据长江天险，以荆州、扬州二州为创业基地，诛除群秽，又“岂徒外藩而已”呢？荆、扬二州几乎囊括了长江中下游的全部区域，资源丰富，人口繁盛。立足东吴以图霸业，就必须据有长江天险，据长江天险，则必争用武之地荆州。在东吴创业之初，张纮就提出了争荆州的战略思想，而且至少早于郭嘉、诸葛亮十三年，这不能不承认张纮战略眼界的高远。

东吴集团力主夺取荆州、据有长江天险的还远不止张纮一人。《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建安五年（200年），孙策死，孙权继任江东之主，向鲁肃咨询如何建立“桓文之功”，鲁肃便建议进占长江中上游：“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帝号以图天下。”^③ 鲁肃提出了一个十分完整的西进战略规划，即第一步以江东为根基，向西北扩展，伺机夺取长江中游的荆州；第二步西进巴蜀进占长江上游的益州，自东至西，“竟长江所

^① 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裴松之注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78页。

^② 陈寿《三国志》卷四十六，裴松之注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16页。

^③ 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四，裴松之注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38页。

极”；第三步以长江天险作为依托，以图争霸天下。鲁肃的建议虽然晚于张纮，但他比张纮看得更远、更全面，且早于郭嘉、诸葛亮，可谓东吴战略家中第一人。建安十三年（208年），刘表病逝，鲁肃又即刻进言乘机占领荆州，实施第一步战略目标：“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① 足见鲁肃的战略眼光是十分敏锐的。

与张纮、鲁肃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周瑜、甘宁等东吴名将。《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载：建安七年（202年），曹操以汉朝名义要孙权质子于朝，孙权召集群臣“会议”，周瑜坚决反对“质子”，并以史为据说：“昔楚国初封于荆山之侧，不满百里之地，继嗣贤能，广土开境，立基于郢，遂据荆、扬，至于南海，传业延祚，九百余年。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有何逼迫，而欲送质？”^② 尽管周瑜不是谈论东吴的战略问题，但他主张东吴集团应仿效当年楚国那样跨有荆、扬二州以角逐天下，分明包含了夺取长江天险的战略思想。

《三国志·甘宁传》记载甘宁归附东吴之初，就向孙权献计曰：“今汉祚日微，曹操弥横，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③ 作为战将，甘宁以粗猛、强悍著称，他建议孙权及早夺取荆州，而实施此目标的第一步就是占领黄祖据守的江夏，其战略意识非普通武将可比。

主张夺占荆州的还有吴郡名士沈友。《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录》载：沈友“弱冠博学，多所贯综，善属文辞。兼好武事，注《孙子兵法》。……权以礼聘，既至，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权敛容敬焉。陈荆州宜并之计，纳之。”^④ 此外，吕蒙、陆逊等东吴名将亦提出过“全据长江”的主张。毫无疑问，相机占据荆州是东吴集团长期思考和反复讨论而最终确定的既定目标。

可见，东汉末年东吴、曹魏、蜀汉三大政治军事集团都清楚地看到了荆州所具有的巨大战略价值，荆州注定要成为三国拼死争夺的焦点。

^① 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四，裴松之注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38页。

^② 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四，裴松之注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32页。

^③ 陈寿《三国志》卷五十五，裴松之注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55页。

^④ 陈寿《三国志》卷四十七，裴松之注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26页。

(二) 汉末三国时期发生于荆州的争夺战

汉末三国时期兵家们纷纷将荆州视为统一天下的关键之地，因而荆州自然会成为金戈铁马的主战场。在这里，我们不妨根据相关史籍粗略地罗列一下汉末三国时期发生在荆州的重要战事：

1. 孙策伐黄祖之战。《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吴录》记载：建安四年（199年）冬，孙策率部进击荆州刘表之江夏太守黄祖，获取刘表妻子及船舰六千艘，杀死或溺毙黄祖士卒数万人。
2. 孙权三征江夏之战。《三国志·吴主传》记载了赤壁之战前孙权在六年之中，进行了三次征伐江夏黄祖之战：建安八年（203年），孙权率部一征江夏，打败了黄祖的水军先锋；建安十二年（207年），孙权二征江夏，虏其若干人口而还；建安十三年（208年）春，孙权三征江夏，杀黄祖，虏其男女数万口返回江东。
3. 当阳之战。《三国志·先主传》等记载：建安十三年（208年）秋，曹操大军南下荆州，刘备率部抢占南郡江陵、夷陵等地，曹操亲率精骑五千穷追不舍，在南郡当阳长坂坡大败刘备，致使刘备丢妻弃子，落荒而逃。
4. 赤壁之战。《三国志·周瑜传》等记载：建安十三年（208年）冬，孙权集团与刘备集团建立联盟，与曹操集团大战于赤壁、乌林等地，重挫曹军，迫使曹军主力退回长江、汉水以北，从而奠定了三足鼎立之势。
5. 南郡争夺战。《三国志·曹仁传》和《吴主传》等记载：建安十四年（209年），赤壁之战后，曹操令其大将曹仁等据守江陵、夷陵等地，东吴周瑜率部围困江陵，刘备遣兵策应。相持一年有余，双方伤亡甚众，曹仁被迫撤至襄阳、樊城一线。
6. 刘备征江南四郡之战。《三国志·先主传》等记载：建安十五年（210年），曹仁退出南郡后，刘备以公安为基地，向南收取了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
7. 孙刘江南对峙战。《三国志·先主传》等记载：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遣吕蒙等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引兵五万自益州直下公安，令关羽率三万人马进驻益阳，与东吴对峙，后因曹操进攻汉中而分割江南握手言和。
8. 关羽围困樊城之战。《三国志·关羽传》等记载：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夏秋，关羽发起进攻曹仁的樊城战役，曹操遣于禁等支援曹仁，关羽利用秋水暴涨之际，歼灭于禁所统七军，俘于禁，斩庞德。